

贫困脆弱性视角下产业扶贫对农户相对贫困的影响

——基于风险响应能力的中介效应分析

耿亚新,刘栩含,饶品样

(郑州大学 旅游管理学院,河南 郑州 450001)

摘要:产业扶贫作为我国扶贫工作中一项重大政策,客观评价其对农村家庭未来相对贫困的影响效果,对推进乡村振兴的实施具有重要意义。以自我发展能力、家庭经济状况和社会资本三个维度构建风险响应能力,采用多元线性回归法和 Bootstrap 中介变量模型法对参与产业扶贫是否抑制农户相对贫困及其作用机理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农户通过参与产业扶贫可以显著降低农户相对贫困的程度,家庭经济状况和自我发展能力在产业扶贫降低相对贫困程度影响中发挥了显著中介效应,而社会资本并未在其中发挥显著中介效应。

关键词:产业扶贫;相对贫困;风险响应能力;Bootstrap 法

中图分类号:F323.8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2-7835(2022)04-0072-09

2020 年底,我国成功完成脱贫攻坚目标,反贫困工作取得了突出的成果,区域性整体贫困和绝对贫困得到解决,但我们在解决贫困问题上仍面临着不少挑战,相对贫困仍然并将长期存在,脱贫户仍存在由于受到风险冲击而重新陷入贫困的可能。2020 年后,我国进入扶贫新阶段,扶贫重心将由解决绝对贫困向缓解相对贫困转变^①。阿玛蒂亚·森提出贫困最根本的原因是个人基本可行能力的缺失,因可行能力被剥夺导致的相对贫困问题则被进一步放大^②。相较于缺乏基本物质生活资料的绝对贫困,相对贫困的治理思路不应仅局限于基本生活物质上的帮扶,而更应注重提升相对贫困者的可行能力,以此提高其可持续发展的能力^③。我国多年的扶贫实践充分证明,解决我国贫困问题的根本在于发展产业。通过产业

扶贫,兴办产业可以提高农户的内生动力,从而达到防止返贫和缓解相对贫困的目标。因此,从贫困脆弱性视角探究产业扶贫如何影响相对贫困,对实现乡村振兴战略,推进农业农村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关于产业扶贫的减贫效果,现有文献主要分为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产业扶贫对于缓解贫困具有正向作用。有学者研究发现产业扶贫可以带动贫困户增收,从而产生减贫的效果^④。还有学者通过研究发现,产业扶贫会对农户的生计策略产生影响,进而影响农户的减贫效果^⑤。近年来,也有一部分学者开始关注产业扶贫对脆弱性的影响,如李玉山、陆远权对湘、鄂、渝和黔邻接区域的脱贫农户数据进行实证研究,认为产业扶贫可以显著降低脱贫农户的生计脆弱性^⑥。另一种

收稿日期:2022-03-16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项目(16CJY047);河南省社科基金项目(2020BJJ057)

作者简介:耿亚新(1982—),女,河南洛阳人,博士,副教授,主要从事产业经济与投资、农村经济研究。

①王小林,张晓颖:《中国消除绝对贫困的经验解释与2020年后相对贫困治理取向》,《中国农村经济》2021年第2期。

②李玲,张馨元,刘一波:《2020年后义务教育相对贫困识别与长效治理机制》,《教育研究》2021年第5期。

③张琦,杨铭宇,孔梅:《2020年后相对贫困群体发生机制的探索与思考》,《新视野》2020年第2期。

④沈宏亮,张佳,郝宇彪:《乡村振兴视角下产业扶贫政策的增收效应研究——基于入户调查的微观证据》,《经济问题探索》2020年第4期。

⑤刘卫柏,于晓媛,袁鹏举:《产业扶贫对民族地区贫困农户生计策略和收入水平的影响》,《经济地理》2019年第11期。

⑥李玉山,陆远权:《产业扶贫政策能降低脱贫农户生计脆弱性吗?——政策效应评估与作用机制分析》,《财政研究》2020年第5期。

观点则认为产业扶贫政策的减贫效果并不显著,甚至会对农户减贫产生负向影响。有学者在研究中发现产业扶贫在实施过程中存在的“精英俘获”、贫困户识别不精准等问题会导致产业扶贫的减贫效果不显著^①。还有学者从农户角度出发,认为农户可行能力的匮乏、主体性缺失、文化贫困等原因导致产业扶贫的减贫效果不显著^{②③}。

现有文献对产业扶贫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研究,这为本文的研究打下了坚实的理论基础,但仍有拓展的空间。第一,国内学者主要从宏观和中观层面出发,对产业扶贫模式、绩效评价以及存在的问题等方面进行了广泛的研究,但却忽视了产业扶贫对产业发展主体——农户所产生的影响。第二,大多数对于产业扶贫减贫效果的研究多集中于产业扶贫对农户收入的影响,忽视了产业扶贫对农户“增能”的作用,也很少涉及对产业扶贫脱贫效果持久性——即对未来贫困影响的研究。在我国全面脱贫、乡村振兴的新形势下,参与产业扶贫对相对贫困影响的理论研究和实证研究相对较少,缺乏有效的数据对其影响机制进行检验。基于此,本文尝试从两个方面对产业扶贫减贫效果的研究进行拓展。一方面,从贫困脆弱性视角出发研究产业扶贫对农户未来相对贫困的作用效果,采用 VEP 法测算出调研数据中农户贫困脆弱性指数,使用多元线性回归法评估产业扶贫对家庭贫困脆弱性影响效果。另一方面,在研究产业扶贫对相对贫困影响的基础上,从自我发展能力、家庭经济状况和社会资本三个维度构建风险响应能力,利用 Bootstrap 中介模型法,从风险响应能力的中介效应出发分析参与产业扶贫对降低农户未来相对贫困的作用效果和作用机理,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提供一定的理论依据。

一 理论分析及研究假设

(一) 产业扶贫对农户相对贫困的影响

向农户提供扶贫信贷、物质补助等“输血式”

扶贫方式对贫困户生产经营收入具有显著正向作用^④,但是产业扶贫更是提升农户内生动力的“造血式”扶贫的重要途径,是降低农户家庭未来相对贫困、消除致贫因素的根本保障^⑤。其目标是提高农户收入,发展当地优势产业,并通过扶贫贷款、开展技术培训、与农户签订农业订单、提供就业机会等政策提高农户内生发展动力,增强风险抵御能力,从而降低家庭未来陷入相对贫困的可能。在脱贫攻坚时期,新安县以产业扶贫为导向,依据当地特色资源大力发展特色种养殖等产业,通过建设扶贫车间、扶贫基地、农村合作社以及与龙头企业合作等,实现产业到户、到人。以洛阳市新安县为例,该县的樱桃、烟叶、核桃、食用菌等特色种植近 30 万亩,直接或间接带动 2.6 万余人脱贫。该县 83 个贫困村到 2019 年底均实现脱贫摘帽,贫困户到 2020 年实现全面脱贫。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如下研究假设:

H1:农户参与产业扶贫可以显著抑制家庭相对贫困的发生。

(二) 风险响应能力的中介作用

家庭的风险抵御能力是应对内外部环境变化、保持家庭稳定运转的能力^⑥。作为一种内在驱动力,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增强农户家庭未来福利水平,在降低家庭未来陷入贫困可能的过程中起着基础性和决定性的作用^⑦。结合风险响应能力的已有研究和本文的研究问题,本文将风险响应能力划分为自我发展能力、家庭经济状况和社会资本三个维度,并基于这三个维度对产业扶贫对相对贫困的影响机制进一步分析。其中,自我发展能力方面,许多学者认为自我发展能力缺失是导致农户贫困的主要原因之一,提升农户自我发展能力是解决贫困问题的重要手段^⑧。家庭经济状况方面,尹秀芳等将风险抵御能力划分为家庭经济资源和家庭社会支持两部分,认为家庭经济资源和社会支持可以提升家庭风险抵御能力^⑨。社会资本方面,社会资本作为一种非正式

①巫林洁,刘滨,唐云平:《产业扶贫对贫困户收入的影响——基于江西省 1047 户数据》,《调研世界》2019 年第 10 期。

②许汉泽,李小云:《深度贫困地区产业扶贫的实践困境及其对策——基于可行能力理论的分析》,《甘肃社会科学》2019 年第 3 期。

③李胜连,张丽颖,马智胜:《扶贫对象可行能力影响因素探析——以赣南等原中央苏区为例》,《企业经济》2019 年第 5 期。

④余洁,陈宝珍,韩啸,等:《扶贫小额信贷对贫困户生产性收入的影响——基于地区与收入差异的实证研究》,《金融经济研究》2020 年第 5 期。

⑤顾宁,刘洋:《产业扶贫降低了贫困农户的脆弱性吗》,《农业技术经济》2021 年第 7 期。

⑥尹秀芳:《子女数量对农村家庭风险抵御能力的影响分析》,《农村经济》2014 年第 8 期。

⑦韩峥:《脆弱性与农村贫困》,《农业经济问题》2004 年第 10 期。

⑧张彦,孙帅:《论构建“相对贫困”伦理关怀的可能性及其路径》,《云南社会科学》2016 年第 3 期。

⑨尹秀芳,杨云彦:《农村家庭风险抵御能力研究——基于湖北省的调查》,《农村经济》2014 年第 10 期。

风险手段承载工具,是农村家庭在面临风险时极为重要的平滑消费手段,对降低贫困起到积极作用^①。

农户通过参与产业扶贫可以提高家庭经济状况从而抑制相对贫困的发生。家庭经济状况是保证家庭正常生存和稳定发展的基础^②,而产业扶贫正是提高家庭经济状况的重要途径。一方面,农户可以直接参与产业扶贫项目获得贷款、资金、奖励等直接收入,也可以参与由政府、农村合作社、龙头企业等组织实施的畜牧养殖、大棚种植等产业扶贫项目中,签订“订单农业”或获得就业机会,从过去只能通过传统种植养殖业获得收入扩大到获得土地租金、分红、工资等多种收益,直接提高农户的收入,解决农户资金瓶颈,为农户的发展和家庭资本提供支撑。例如,我们在调研中发现新安县五头镇、磁涧镇成立农业合作社,大力发展樱桃特色种植产业和采摘园,至2019年,樱桃种植面积达到三万余亩,实现年增收超3.2亿元,成为当地扶贫的主导产业,极大地改善了农户家庭经济状况,带动了贫困群众脱贫致富。另一方面,在产业扶贫过程中,农业、农村基础设施不断提升,这有利于吸引更多投资,增加农户发展的机会,提高农户家庭经济状况。综上可知,产业扶贫可以增加农户的收入,盘活和利用贫困地区自然资源,通过增强产业融合发展,提高产业获利能力,为贫困户提供获得财产收益的机会,从而降低家庭脆弱性。

参与产业扶贫可以通过提高农户自我发展能力从而抑制相对贫困的发生。农户参与产业扶贫,一方面政府定期对农户进行相关产业的技术培训和指导,可以提升农户的内生动力;另一方面,农户在进入合作社和龙头企业工作时,又会获得与工作相关的技术培训。农户通过接受农业或非农就业技术培训,提高其技术水平和经营管理能力,增加其参与程度,可以激发农户自身发展能力,从而降低贫困脆弱性。例如洛阳大资塑业有

限公司在洛阳市共建立扶贫车间17个、加工点110多个,为贫困户配置设备,带动贫困户就业创业,通过对贫困户技术培训提高其自身发展能力。

参与产业扶贫可以通过增强农户社会资本抑制相对贫困的发生。中国社会传统的“关系思维”根深蒂固,社会资本作为一种抵御风险的非正式手段,可以在家庭面临风险时通过无息借贷等方式帮助家庭抵御风险^③,平滑消费水平,降低家庭贫困脆弱性^④。参与产业扶贫是一种很好的提升农户家庭社会资本的途径,产业扶贫通过构建贫困人口与产业主体的利益共同体,有利于重构并提高农户的社会资本^⑤。产业扶贫中农村合作社、龙头企业等除了具备经济属性,往往还具备社会属性,合作社的组织者大多都是村庄内的“精英”,如村干部、种植大户等,社员大多数为本村或邻近村庄的农户,因而社员之间具有一定的地缘或血缘关系^⑥。农户通过加入合作社或与企业进行合作,在企业内就业时,农户还会与他人形成业缘关系,这些都能有效扩张社会关系网络,拓宽农户获得信息的渠道,农户的社会资本也得到了提升。基于以上分析,本文得到产业扶贫对农户家庭相对贫困的影响作用机制如图1所示,并提出以下假设:

H2:参与产业扶贫通过提高农户自我发展能力从而抑制相对贫困的发生。

H3:参与产业扶贫通过提高家庭经济状况从而抑制相对贫困的发生。

H4:参与产业扶贫通过增强家庭社会资本从而抑制相对贫困的发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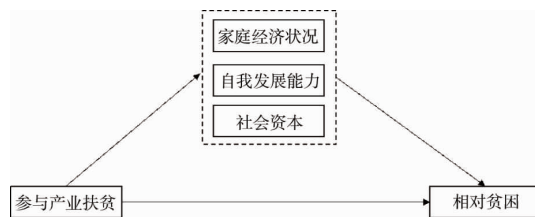


图1 参与产业扶贫对农户家庭相对贫困的影响作用机制

①何军,沈怡宁,唐文浩:《社会资本、风险抵御与农村女户主家庭贫困脆弱性的研究——基于CFPS数据的实证分析》,《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3期。

②Annamaria L, Daniel J, Peter T. “Financially fragile households: evidence and implications”, *Brookings Papers on Economic Activity*, 2011 (1): 83-134.

③Munshi K, Rosenzweig M. “Traditional institutions meet the modern world: caste, gender, and schooling choice in a globalizing economy”,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2006, 96(4): 1225-1252.

④徐伟,章元,万广华:《社会网络与贫困脆弱性——基于中国农村数据的实证分析》,《学海》2011年第4期。

⑤刘红岩:《中国产业扶贫的减贫逻辑和实践路径》,《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1期。

⑥赵晓峰,王晶晶:《农户参与合作社的行为决策及其影响因素分析——基于村域社会资本视角》,《中共福建省委党校学报》2018年第12期。

二 数据来源与变量设定

(一) 数据来源

笔者于2020年3月和2020年8月先后两次在河南省洛阳市新安县进行深度调查,采集到了该县农户参与产业扶贫的相关数据。调研按照全县所有乡镇全覆盖的原则,每个乡镇随机选择1—2个村列入进村入户调研计划。本次调研共发放问卷310份,通过剔除存在异常值或逻辑错误等问题的调查问卷,获得有效问卷297份,有效率95.81%。

(二) 变量选取与说明

(1)被解释变量。本文选取的被解释变量为农户相对贫困。由于国内尚未形成固定方法对农户相对贫困进行测度,且贫困具有长期性和不可观测性的特征,而贫困脆弱性可以预测农户家庭未来陷入贫困的可能,具有前瞻性,可以对贫困起到预测的作用。因此,文本引入贫困脆弱性作为农户相对贫困的指标。

(2)解释变量。本文选取是否参与产业扶贫作为解释变量。将参与产业扶贫项目的农户家庭赋值为“1”,未参与产业扶贫项目的家庭赋值为“0”。

(3)中介变量。本文选取风险响应能力中的自我发展能力、家庭经济状况和社会资本作为中介变量。自我发展能力就是农户能够自主获取资源、提高生存技能从而发展生产的能力,提高农户自我发展能力最重要的途径就是进行农业或非农就业技术培训。本文从农户参加培训效果来衡量自我发展能力,选用问题“通过参加培训自己的技能是否得到提升”来衡量自我发展能力,其中,1代表几乎没有得到提升,2代表比较少,3代表一般,4代表得到较大提升,5代表得到非常大的提升。选择“近三年来家庭经济状况是否得到改善”来衡量家庭经济状况,其中,1代表几乎没有改善,2代表改善效果较小,3代表改善效果一般,4代表改善效果较好,5代表改善效果非常好。社会资本也是风险响应能力中的重要一项,当家庭遭遇风险时,通过向亲朋好友求助对家庭福利水平起到平滑的作用,从而抑制相对贫困的发生。选择“您家一年礼金支出约为多少”来衡量社会资本,将受访者回答金额按“0元—499元”“500元—999元”“1000元—1499元”“1500元—

1999元”“2000元及以上”赋值为1—5,1代表非常少,2代表较少,3代表一般,4代表较多,5代表非常多,赋值越高,代表每年家庭礼金支出越高,家庭的社会资本也就越高。

(4)控制变量。根据已有文献可知,农户发展特征差异和地区特征差异会对农户家庭贫困脆弱性产生一定的影响,因此,选择户主层面、家庭层面和地区层面相关变量作为本文的控制变量。

户主层面相关变量主要包括户主的年龄、性别、健康状况、受教育程度和政治面貌。户主作为一家之主,是家庭中重要的经济来源,对整个家庭的风险抵抗能力和家庭成员的影响非常深远。随着户主年龄的增加,健康水平的下降,抵御风险的能力会有所降低,面临健康等风险冲击的可能性却会增加,家庭未来陷入贫困的概率也会增加。在传统观念中,农村家庭中男性外出务工概率更高,因此户主性别也会对家庭贫困状况产生影响;户主受教育水平越高,收入水平会越高,并且也会提高子代接受教育的机会,使家庭人力资本增加,从而增强家庭经济能力和社会资本等抵御风险的能力,降低家庭贫困脆弱性。

家庭层面相关变量主要包括家庭规模、劳动力数量、是否有外出务工人员、耕地面积和是否有汽车。家庭劳动力是家庭收入的主要来源,家庭规模较大且劳动力数量越大,家庭收入来源就会越广,收入水平就会越高,会对家庭贫困状况产生影响;耕地面积和是否有汽车是家庭资本状况的重要指标。

地区特征包括距县城距离和基础设施环境状况。本文调研对象均是农村农户,因此地区特征主要是以村庄特征作为变量,通常来说,村庄距离县城越近、交通越方便、基础设施环境越好,家庭贫困发生的概率越低^①。变量选择及具体说明如表1所示。

(三) 贫困脆弱性测度

贫困脆弱性是指由于个人或家庭遭受外部风险冲击及抗风险能力下降,导致未来消费水平难以保持平滑和稳定,维持在贫困线以下的概率^②。目前贫困脆弱性的测量主要有风险暴露脆弱性(VER)、期望贫困脆弱性(VEP)和期望效用脆弱性(VEU)三种方法。风险暴露脆弱性(VER)是通过估计家庭福利水平对风险冲击的敏感程度来

①杨慧敏,罗庆,许家伟:《中国农村贫困的动态发展及影响因素分析——基于CHNS数据》,《经济经纬》2016年第5期。

②Stefan D. “Rural poverty: old challenges in new contexts”, *The World Bank Research Observer*, 2009, 24(1): 1-28.

测量贫困脆弱性^①,本质上是一种事后的测度,不具有预测性。期望效用脆弱性(VEU)主要是通过期望消费的效用水平与均衡消费的效用水平之差来测度贫困脆弱性^②,对数据在时间跨度上有较高的要求,且所使用的效用函数单一,并未考察家庭偏好多样性,该方法的使用具有较大的限制性。期望贫困脆弱性(VEP)是通过计算家庭预期福利水平在 $t+1$ 期低于贫困线的概率来测度贫困脆弱性^③,可以利用截面数据,通过可观测的变

量预测下一期的贫困脆弱性,对于数据的要求相对较低^④。因此,本文采用VEP的测量方法,计算方法如下。

首先,根据期望贫困脆弱性(VEP)的测量方式,第 i 个农户家庭第 t 期的贫困脆弱性如式(1)所示。

$$vul_{i,t} = P(Y_{i,t+1} < z) = \int_{-\infty}^z f(Y_{i,t+1}) d(Y_{i,t+1}) \quad (1)$$

表1 相关变量选择与说明

变量	变量定义及赋值
被解释变量	
相对贫困	贫困脆弱性指数
解释变量	
是否参与产业扶贫	是=1,否=0
中介变量	
自我发展能力	几乎没有得到提升=1,比较少=2,一般=3,得到较大提升=4,得到非常大提升=5
家庭经济状况	几乎没有改善=1,改善效果较小=2,改善效果一般=3,改善效果较好=4,改善效果非常好=5
社会资本	非常少=1,较少=2,一般=3,较多=4,非常多=5
控制变量	
户主年龄	实际数值(岁)
户主性别	男=0;女=1
户主健康状况	非常健康=5,很健康=4,比较健康=3,一般=2,不健康=1
户主受教育程度	最高学历赋值:大学本科及以上=6,大专=5,高中/中专/技校=4,初中=3,小学=2,文盲=1
户主政治面貌	中共党员=1,其他=0
家庭规模	农户日常生活在一起、收入与消费都在一起的总人数
劳动力数量	家庭中大于16岁小于65岁且有劳动能力的人数
是否有外出务工人员	是=1,否=0
耕地面积	家庭总耕地面积
是否有汽车	是=1,否=0
距本县县城距离	非常远=1,较远=2,一般=3,较近=4,非常近=5
基础设施环境状况	非常差=1,较差=2,一般=3,较好=4,非常好=5

(1)式中, $vul_{i,t}$ 是第 i 个农户家庭第 t 期的贫困脆弱性指数, $Y_{i,t+1}$ 表示第 i 个农户家庭在第 $t+1$ 期的消费, z 为选定的贫困线, $f(Y_{i,t+1})$ 为第 i 个农户家庭在第 $t+1$ 期消费分布的概率密度函数。基于Christiaensen等^⑤的研究,假定人均消费对数为正态分布,因此贫困脆弱性指数的计算公

式进一步表述如式(2)所示。

$$vul_{i,t} = \int_0^{\ln z} f(\ln Y_{i,t+1}) d(\ln Y_{i,t+1}) = \varphi\left(\frac{\ln z - \mu \ln Y_{i,t+1}}{\sigma \ln Y_{i,t+1}}\right) \quad (2)$$

式(2)中, $\varphi(\bullet)$ 为对数正态分布, $\mu \ln Y_{i,t+1}$ 、 $\sigma \ln Y_{i,t+1}$ 分别为第 i 个农户家庭消费对数的期望值和方差,如式(3)、式(4)所示。

①Ligon E, Schechter L. "Measuring Vulnerability", *The Economic Journal*, 2003, 113(486): 95-102.

②Jalan J, Chaudhuri S, Suryahadi A. *Assessing Household Vulnerability to Poverty from Cross-sectional Data: a Methodology and Estimates from Indonesia*. Columbia University, 2002.

③蒋丽丽:《贫困脆弱性理论与政策研究新进展》,《经济动态》2017年第6期。

④Mosley P, Verschoor A. "Risk Attitudes and the 'Vicious Circle of Poverty'", *The European Journal of Development Research*, 2005, 17(1): 59-88.

⑤Christiaensen L J, Subbarao K. "Toward an Understanding of Household Vulnerability in Rural Kenya", *Policy Research Working Paper Series*, 2005, 14(4): 520-558.

$$\mu \ln Y_{i,t+1} = \hat{E}[\ln Y_i | X_i] = X_i \hat{\beta}_{FGLS} \quad (3)$$

$$\sigma \ln Y_{i,t+1} = \sqrt{\text{var}[\ln Y_i | X_i]} = X_i \hat{\theta}_{FGLS} \quad (4)$$

为了得到 $\hat{\beta}_{FGLS}$ 和 $\hat{\theta}_{FGLS}$, 首先建立家庭人均消费对数方差如式(5)所示。

$$\ln Y_i = X_i \beta + e_i \quad (5)$$

式(5)中, X_i 表示影响家庭消费的相关变量, 包括户主层面(户主年龄、性别、健康状况、受教育程度、婚姻状况和政治面貌)、家庭层面(家庭规模、劳动力数量、耕地面积、人均收入水平)、村居层面相关信息(距本县县城距离、基础设施环境状况)及家庭可能遭受到的风险冲击(是否有慢性病、大病人员、是否有残疾人和家中是否有大学生)等; β 为参数向量; e_i 为消费方程残差, 表示消费波动。通过 OLS 回归得到消费方程的残差如式(6)所示。

$$e_i^2 = X_i \theta \quad (6)$$

通过三阶段可行广义最小二乘法(FGLS)对 β 和 θ 进行估计得到估计量 $\hat{\beta}_{FGLS}$ 和 $\hat{\theta}_{FGLS}$, 进而得到 $\mu \ln Y_{i,t+1}$ 和 $\sigma \ln Y_{i,t+1}$, 最终得到贫困脆弱性的测量方程如式(7)所示。

$$vul_{i,t} = \varphi \left(\frac{\ln z - X_i \hat{\beta}_{FGLS}}{X_i \hat{\theta}_{FGLS}} \right) \quad (7)$$

三 实证分析

(一) 农户家庭贫困脆弱性分析

本文在参考相关文献的基础上, 按照 VEP 的测算方法, 并结合所调研的数据, 选取国家现行贫困标准年人均纯收入 3 200 元作为贫困脆弱性测量的贫困线对调研地区农户家庭贫困脆弱性进行测算, 得到每个农户家庭贫困脆弱性指数。参考

以往学者在贫困脆弱性的研究中提出的将 0.29 作为脆弱线这一观点^①, 以家庭贫困脆弱性 0.29 作为脆弱线, 指数高于 0.29 为高脆弱家庭, 低于 0.29 则为低脆弱家庭。

在调研的 297 户农村家庭中, 有 99 户家庭贫困脆弱性指数高于 0.29, 属于高脆弱家庭; 有 198 户家庭贫困脆弱性指数低于 0.29, 属于低脆弱家庭。通过统计结果可知, 该地区有近三分之一农户家庭处于高贫困脆弱状态, 仍然处于相对贫困状态。

(二) 农户产业扶贫参与现状

在产业扶贫政策实施过程中, 未参与产业扶贫项目的农户家庭有 63 户, 占全部样本的 21.21%, 参与产业扶贫项目的农户家庭有 234 户, 占全部样本的 78.79%。这表明, 调研地区绝大多数农户都选择参与产业扶贫项目。在该参与方式下, 农户可以通过政府获得产业发展所需资金、实物或技术帮扶, 选择适合自己的、可以依托当地资源发展的规模种植、养殖等特色产业, 既符合农户从事传统农业发展的习惯, 又能提高农户自身农业技术水平和家庭收入。

参与产业扶贫和未参与扶贫两组农户的风险响应能力和贫困脆弱性均值差如表 2 所示。通过表 2 可以看出: (1) 参与产业扶贫的农户贫困脆弱性较低, 且贫困脆弱性指数均值小于脆弱线 0.29, 这表明参与产业扶贫的农户家庭未来陷入贫困的可能会更低。(2) 参与产业扶贫的农户家庭经济状况、自我发展能力和社会资本也均比未参与产业扶贫农户要高, 说明参与产业扶贫农户的风险响应能力更高。

表 2 风险响应能力及贫困脆弱性是否参与产业扶贫组间均值差

变量	参与产业扶贫(1)		未参与产业扶贫(2)		组间均值差(1)-(2)
	均值	标准差	均值	标准差	
贫困脆弱性	0.16	0.16	0.50	0.22	-0.34
家庭经济状况	3.76	1.08	1.43	0.61	2.33
自我发展能力	3.90	1.02	1.59	0.61	2.31
社会资本	3.47	1.13	2.86	1.01	0.61

(三) 产业扶贫参与对相对贫困影响检验

为了验证农户参与产业扶贫对家庭相对贫困的影响, 本文参考宁静等^②等对贫困脆弱性影响

因素的研究思路, 构建基准模型:

$$vul_i = \alpha_0 + \alpha_1 D_i + \alpha_2 C_i + \varepsilon_i \quad (8)$$

式(8)中, vul_i 为第 i 个农户的家庭贫困脆弱性,

①斯丽娟:《家庭教育支出降低了农户的贫困脆弱性吗——基于 CFPS 微观数据的实证分析》,《财经研究》2019 年第 11 期。

②宁静, 殷浩栋, 汪三贵, 等:《易地扶贫搬迁减少了贫困脆弱性吗? ——基于 8 省 16 县易地扶贫搬迁准实验研究的 PSM-DID 分析》,《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8 年第 11 期。

D_i 为第 i 个农户家庭是否参与产业扶贫, C_i 为控制变量:户主、家庭和地区特征, α_0 为截距项, α_1 为参与产业扶贫对农户家庭贫困脆弱性的影响系数, α_2 为控制变量对农户家庭贫困脆弱性的影响系数, ε_i 为随机扰动项。

在回归模型的实证检验中,模型(1)为未加入控制变量时参与产业扶贫对农户相对贫困的影响,模型(2)为加入户主、家庭和地区特征作为控制变量后参与产业扶贫对农户相对贫困的影响,回归结果如表3所示。

表3 参与产业扶贫对农户相对贫困影响的检验结果

变量	模型(1)		模型(2)	
	系数值	标准误	系数值	标准误
是否参加产业扶贫	-0.347***	0.024	-0.120***	0.017
户主年龄			0.004***	0.001
户主性别			0.120***	0.020
户主健康状况			-0.012*	0.007
户主受教育程度			-0.028***	0.006
户主政治面貌			-0.067***	0.018
家庭规模			0.009***	0.005
劳动力数量			-0.101***	0.008
是否有外出务工人员			0.012	0.012
耕地面积			0.001**	0.005
是否有汽车			-0.020	0.015
距本县县城距离			-0.007	0.006
基础设施环境状况			-0.044***	0.008
常数项	0.504***	0.021	0.212***	0.047
n	297		297	
R^2	0.419		0.811	

注:***、**、*分别表示10%、5%和1%显著性水平,下同。

由未加入控制变量的模型(1)和加入控制变量的模型(2)的检验结果可知农户参与产业扶贫对贫困脆弱性的影响系数均在1%水平上显著为负,表明农户通过参加产业扶贫显著降低了家庭贫困脆弱性,抑制了农户相对贫困的发生,H1得以验证。

在模型(2)户主特征的控制变量中,户主年龄显著正向影响家庭贫困脆弱性,而户主受教育水平、性别和政治面貌显著负向影响家庭贫困脆弱性,即户主年龄越小、受教育水平和健康水平越高以及作为党员都会使家庭未来陷入贫困的概率降低,从而抑制农户相对贫困的发生。户主作为一家之主,是家庭中重要的经济来源,对整个家庭抵抗风险的能力和家庭成员的影响非常深远,而随着户主年龄的增加,健康水平的下降,抵御风险的能力会有所降低,面临健康等风险冲击的可能性却会增加,家庭未来陷入贫

困的概率也会增加。户主受教育水平越高,收入水平会越高,并且也会提高子代接受教育的机会,增加家庭人力资本,从而增强家庭经济能力和社交能力等抵御风险的能力,降低家庭贫困脆弱性,抑制农户相对贫困的发生。在家庭特征的控制变量中,家庭规模会显著正向影响农户家庭贫困脆弱性,家庭规模越大,家庭中的抚养负担也会加重,家庭贫困脆弱性也会增强。家庭劳动力人数会降低家庭未来贫困的概率,这是因为当家庭遭受风险冲击时,家庭如果有足够的劳动力则可以通过务工等方式获得收入来平滑消费,从而降低家庭陷入贫困的概率,抑制相对贫困的发生。家庭拥有耕地会增加农户家庭贫困脆弱性的原因可能是家庭拥有的耕地越多,越能吸引家庭劳动力从事农业活动,从而降低了从事其他工作的可能,减少了收入来源,而依靠土地获得的农业收入又相对较少,且非常依赖天气等自然条件,收入具有不稳定性,仅依靠农业收入难以抵御家庭所面临的风险冲击。

(四)风险响应能力在产业扶贫对相对贫困影响的中介效应检验

由理论推断可知,产业扶贫主要通过农户家庭经济状况、自我发展能力和社会资本对相对贫困产生影响。为进一步分析产业扶贫对相对贫困影响的理论机制,以相对贫困作为因变量,是否参与产业扶贫作为自变量,农户自我发展能力、家庭经济状况和社会资本作为中介变量,利用Bootstrap法多个并列中介变量模型,在控制户主特征变量、家庭特征变量和地区特征变量情况下对农户自我发展能力、家庭经济状况和社会资本在参与产业扶贫对相对贫困影响的中介效应进行检验,结果如表4、表5所示。

由表4可知,参与产业扶贫对相对贫困的负向影响显著($B = -0.121, t = -5.158, p < 0.01$),说明参与产业扶贫显著降低了农户家庭贫困脆弱性,抑制了相对贫困的发生,这验证了H1。当放入中介变量(自我发展能力、家庭经济状况和社会资本)后,参与产业扶贫对贫困脆弱性仍然产生负向影响,且影响显著($B = -0.045, t = -1.920, p < 0.1$),自我发展能力和家庭经济状况对贫困脆弱性的负向影响显著($B = -0.022, t = -2.533, p < 0.1$; $B = -0.038, t = -4.529, p < 0.01$),社会资本对贫困脆弱性产生负向影响,但影响并不显著($B = -0.004, t = -0.757, p > 0.1$)。参与产业扶贫对自我

发展能力、家庭经济状况均会产生显著正向影响 ($B=1.137, t=6.897, p<0.01$; $B=1.132, t=9.998, p<0.01$), 对社会资本也会产生正向影响, 但影响并不显著 ($B=0.264, t=1.477, p>0.1$)。

表 4 自我发展能力、家庭经济状况和社会资本在产业扶贫对相对贫困影响的中介效应检验

回归方程 ($N=297$)		拟合指标		系数显著性	
结果变量	预测变量	R^2	F	B	t
自我发展能力		0.780	34.091		
	是否参与产业扶贫			1.137***	6.897
家庭经济状况	控制变量	0.840	64.606	是	是
	是否参与产业扶贫			1.132***	9.998
社会资本	控制变量	0.409	5.704	是	是
	是否参与产业扶贫			0.264	1.477
相对贫困	控制变量	0.900	75.294	是	是
	是否参与产业扶贫			-0.121***	-5.158
相对贫困	控制变量	0.919	97.355	是	是
	自我发展能力			-0.022*	-2.533
	家庭经济状况			-0.038***	-4.529
	社会资本			-0.004	-0.757
	是否参与产业扶贫			-0.045*	-1.920
	控制变量			是	是

表 5 自我发展能力、家庭经济状况和社会资本在产业扶贫对相对贫困影响的总效应、直接效应及中介效应分解表

		效应值	Boot 标准误	Boot CI 下限	Boot CI 上限
中介效应	总效应	-0.121	0.023	-0.167	-0.075
	直接效应	-0.045	0.023	-0.091	0.001
	总中介效应	-0.076	0.014	-0.108	-0.053
	自我发展能力的中介效应	-0.025	0.010	-0.046	-0.030
	家庭经济状况的中介效应	-0.050	0.012	-0.076	-0.063
	社会资本的中介效应	-0.001	0.002	-0.008	0.001
	中介效应比较	自我发展能力 vs 家庭经济状况	0.026	0.017	-0.006
	自我发展能力 vs 社会资本	-0.023	0.011	-0.046	-0.004
	家庭经济状况 vs 社会资本	-0.049	0.012	-0.075	-0.029

由表 5 可知,在 95%的置信区间下,参与产业扶贫的直接效应不显著 (Boot CI 下限 -0.091, Boot CI 上限为 0.001) 包含 0,作用大小为 -0.045,三个中介变量共同发挥的中介效应显著,区间 (Boot CI 下限 -0.108, Boot CI 上限为 -0.053) 没有包含 0,作用大小为 -0.076,表明风险响应能力在产业扶贫对贫困脆弱性影响中发挥完全中介效应。在三个中介路径中,自我发展能力和家庭经济状况均发挥了显著的中介效应,中介效应的大小依次为 -0.024 和 -0.050,这表明农户通过参与产业扶贫可以提高其自我发展能力和家庭经济状况,从而抑制农户相对贫困的发生,但社会资本中介变量的中介作用并不显著。为更好地区分其作

用的相对大小,对三个路径作用的大小进行了比较。由数据结果可知,家庭经济状况的中介作用显著高于自我发展能力和社会资本的中介作用,其他中介路径并没有显著差异。这验证了 H2 和 H3,否定了 H4。

四 研究结论与建议

(一) 主要结论

(1)在产业扶贫政策实施过程中,调研地区绝大多数农户都参与到了产业扶贫项目中。农户风险响应能力普遍得到提高,农户的自我发展能力、家庭经济状况以及所拥有的家庭社会资本普遍得到了明显提升。虽然在现行标准下我国贫困

户已实现全面脱贫,但在调研地区,仍有近三分之一农户家庭处于高贫困脆弱的状态,未来可能会面临陷入贫困的风险。参与产业扶贫的农户高脆弱家庭占比远低于未参与产业扶贫家庭。

(2)农户通过参与产业扶贫可以显著降低贫困脆弱性,抑制农户相对贫困的发生,进一步分析其对农户相对贫困的影响及作用机制可知,家庭经济状况和自我发展能力在产业扶贫对相对贫困影响中发挥了中介效应,且影响显著,即农户通过参与产业扶贫可以提高家庭经济状况和自我发展能力,从而抑制了农户相对贫困的发生;但社会资本的中介作用并不显著。此外,家庭经济状况的中介作用显著高于自我发展能力和社会资本的中介作用,其他中介路径并没有显著差异。

(二) 政策建议

(1)完善对贫困对象的识别标准,建立健全贫困对象信息系统和动态识别及退出机制。虽然我国已经实现现行标准下贫困户全面脱贫,但仍有一部分脱贫者和非贫困户风险响应能力较低,在遭受到风险冲击时没有抵御风险的能力,导致未来可能会继续陷入贫困。因此,在以后的农村工作中,要注重关注农户家庭的贫困脆弱性和相对贫困,除将收入作为识别贫困的标准外,还应将其健康、家庭教育、工作、未来可能面临的风险冲击、应对风险能力等与未来贫困相关的信息纳入识别标准中,并详细记录目标对象的各项识别指标,利用大数据技术

对救助对象相关指标进行动态识别及预警,增强高脆弱家庭风险响应能力,降低家庭未来陷入贫困的可能,抑制相对贫困的发生。

(2)完善产业扶贫政策,实现产业扶贫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从研究结果可以看出,农户参与产业扶贫对降低家庭贫困脆弱性具有显著影响,说明参与产业扶贫可以增强农户的风险响应能力,从而抑制农户相对贫困的发生。因此,乡村振兴首先要关注产业振兴,为实现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的有限衔接,应持续将产业发展放在核心位置。首先,在巩固脱贫成果和乡村振兴期间,应进一步扩大产业发展的范围和对象,将脱贫户和非贫困户都引入产业发展的道路上来,提高农户自我发展能力,提升其家庭经济状况和社会资本,增强风险抵御能力,降低由于缺乏抵御风险的能力而再次陷入贫困的概率,抑制相对贫困的发生。其次,注重发展新型经营主体,要注重培育和发展农村合作社、龙头企业等新型经营主体,并提高农户与新型经营主体的合作概率,基于当地产业优势,发展特色产业,吸引当地农户整合产业化经营,为当地农户提供技术培训、就业岗位等,提高农户自我发展能力,拓宽农户的收入渠道,让更多的农户充分参与到农业产业链中。最后,引进更多的专业技术人员、专家、社会组织机构、科研单位等参与到产业扶贫中,为更好地科学发展产业提供技术上的支撑。

The Impact of Industrial Poverty Alleviation on the Relative Poverty of Rural Household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Vulnerability to Poverty: Based on the Mediating Effect of Risk Response Capability

GENG Ya-xin, LIU Xu-han & RAO Pin-yang

(School of Tourist Management, Zhengzhou University, Zhengzhou 450001, China)

Abstract: As a major policy in Chinese poverty alleviation work, objectively evaluating industrial poverty alleviation's impact on the future relative poverty of rural families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for its own implementation and improvement. Risk response capability is constructed from three dimensions, i.e. self-development ability, family economic status, and social capital. Multiple linear regression method and Bootstrap method are used to test whether participation in industrial poverty alleviation inhibits the relative poverty of farmers and its mechanism. Results show that farmers can significantly reduce the degree of relative poverty of farmers by participating in industrial poverty alleviation. The family economic status and self-development ability have played a significant mediating effect in the reduction of relative poverty by industrial poverty alleviation, while social capital has not played a significant mediating effect.

Key words: industrial poverty alleviation; relative poverty; risk response capability; Bootstrap method
(责任校对 葛丽萍)